

胡适 著

胡适英文

中國思想史

授課綱要遺稿

整理本



导读 王汎森
策划 潘光哲
主编 吴浩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胡适 著

胡适英文

中國思想史

授課綱要遺稿

整理本



导读 王汎森
策划 潘光哲
主编 吴浩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：整理本：英文 / 胡适著；吴浩主编. — 北京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-7-5213-0754-2

I. ①胡… II. ①胡… ②吴… III. ①思想史—研究—中国—英文
IV. ①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38557 号

本书手稿图片由台北胡适纪念馆提供

出版人 徐建忠
责任编辑 段会香
责任校对 易璐
封面设计 InkCamp
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(100089)
网址 <http://www.fltrp.com>
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9×1194 1/32
印张 9.5
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213-0754-2
定价 69.00 元

购书咨询：(010) 88819926 电子邮箱：club@fltrp.com

外研书店：<https://waiyants.tmall.com>

凡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联系我社印制部

联系电话：(010) 61207896 电子邮箱：zhijian@fltrp.com

凡侵权、盗版书籍线索，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

举报电话：(010) 88817519 电子邮箱：banquan@fltrp.com

物料号：307540001



记载人类文明
沟通世界文化
www.fltrp.com

1. The Peking Man (*Sinanthropus Pekinensis*)
found in 1927-1929 and later.

- (2) 1. Pithecanthropus (Java Man) (猿人)
2. Peking Man
3. Neanderthal Man (Rhine Valley)

2. The Palaeolithic Culture found in 1922-1929
~~1929~~

1. Ordos region
2. Yellow River Valley between Shensi + Shansi
3. Near the Peking Man (1933-1934)
(But not Chinese)

Anyang Excavations

✓ 小屯
✓ 小屯(殷墟)

✓ ① 1928 (Oct.)

骨字甲号 784

✓ ② 1929 (March - May)

骨字甲号 684

✓ ③ 1929 (Oct. - Dec.)

大龟的版, 石雕人像
骨字甲号 300

✓ ④ 1931 (March - May)

骨字甲号 781

✓ ⑤ 1931 (Nov. - Dec.)

“ 381

⑥ Attitude towards knowledge, and learning

He wishes to abolish all knowledge & learning.

He ~~was~~ was most emphatic in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& learning.

不出戶，知天下。(楚)

(22) I have often spent ^{whole} days

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

Note: In a later period (2nd century) there arose the "Law of the Sequence of Production of the Five Virtues" (相生):

木	火	土	金	水	Wood
生	生	生	生	生	↓
火	土	金	水	木	Fire
					↓
					Earth
					↓
					Metal
					↓
					Water
					↓
					Wood

天下模楷 (Model of ~~the~~ Mankind)
李元礼 Li Yuan-li
(Li Ying, d. 169)

不畏強禦 (Never cowed by Powerful Opposition)
陳仲舉 Chien chung-chün

道 - (Tao Yi) 馬祖

~~native~~ who taught a much-simplified doctrine: "Everything is Tao, and letting ~~the~~ ~~the~~ setting the mind free is Ch'an."

無類是道，任心為修。

There is no Law to abide by.
There is no Buddhahood to attain; 無法可拘，無佛可作。

序

身为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事业领导者的李济，田野劳动，辛苦备至，挖掘所得，整理费时，始终难能竣事；在他看来，如何利用这些考古成果，与传统资料文献相结合，跨越中国国境之界限，将视野投注于东北亚、东南亚与中亚，以求取对诸方地域的史前文化之了解，更是桩蓄势待发的事业。不过，让他忿忿不平的是，在安阳其实没待上几天的美国学者顾立雅（Herrlee Glessner Creel），时过未久，就写出了考古成果综合报告：*The Birth of China: 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* (1936)。即如亲炙过李、顾两人风范的许倬云，在口述历史《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：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》（2010）里就回忆说，李济对顾立雅很“有意见”，批评说：“我们还没有发掘报告，他已经写了一本书了”。许倬云则告诉李济：“不能怪人家写得快，只能怪我们自己写得慢。”

确实，顾立雅的贡献，彰明昭著；他者毋言，连在日记里评价顾立雅“狂妄”的胡适，都得在教书时，引用这部*The Birth of China*作为向学生授业解惑的依据之一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（整理本）》，就是证据。借这个例证，也足以想见，胡适在最高学术殿堂里教学开讲，向新生代引证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，不愧一代“经师”风范。我辈其生也晚，没有恭逢其盛的机会；借着胡适留传下来的文字纪录，揣摩再三，怀想其景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

这部《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（整理本）》，是胡适从1944年11月起，至1945年6月止，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授“中国思想史”的讲课纲要；不仅是梳理胡适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必需之资料，也是胡适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者（余英时先生的观点）最忠实的纪录。

早在1922年2月23日，胡适就接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（Nicholas Murray Butler）正式信函的邀请到哥大任教，讲授“中国哲学”与“中国文学”两门课程。胡适考虑，如果接受邀请，“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《古代哲学史》罢了”，自己规划撰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全帙必不能成书，因此辞谢了。此后，胡适得到美国耶鲁大学、芝加哥大学等校的邀请，都未可成行。直到1933年7月，胡适始前往芝加哥大学担任哈斯克讲席（Haskell Lecture）。讲稿所成，就是胡适的英文名著之一：《中国的文艺复兴》（*The Chinese Renaissance: The Haskell Lectures*, 1934）。英国著名（社会主义立场的）史学家，也应国际联盟邀请来考察过中国教育的汤尼（R. H. Tawney，这是当时中国舆论界对他的称呼）当时发表书评，认为没有人比胡适更有资格来解释中国，称许这部书是当时英文世界里研究中国的最佳导论。凡此诸端，足可证明，胡适在英语学术圈里，已然占有一席之地。

盛名所至，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之后，胡适接受蒋介石要求，前往美国进行舆论宣传与交涉工作；翌年4月，就接到哈佛大学教授叶理绥（Serge Elisséeff）邀请任教一年的来信；正为国事倥偬的他，当然没有接受。直到胡适在1942年9月了却驻美大使的公职，暂时滞居美国纽约，叶理绥重提旧议，并经过当时人也在哈佛的老友赵元任几回催促，胡适终于点头同意，接受邀请，于1944年10月22日自纽约启程前往哈佛大学，开始了为期八个月左



右的教学生活。

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，虽然开设了“中国哲学史”的课程，更多的则是以“思想史”为名的课程（如“中古思想史”“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”“汉代思想史”与“唐宋思想史”等等），这无疑反映了胡适对哲学、哲学史的看法，已经出现了变化。本书作为胡适教学授业的蓝图，纲目与例证并存，清楚地表达了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系统构想，更一度激发了他依据这些授课的准备材料，整理撰写一部英文《中国思想小史》的雄心。即使胡适的理想最终未可落实，有心之士想要开展探窥胡适思路变迁的知识探险事业，凭借本书，自是又得一助。

胡适于1944年11月6日第一回登上哈佛大学这门“中国思想史”课程的讲台，“课堂坐满了”，面对满座的美国学生，讲述中国思想的历史变化，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，增益学生的知识，激发学生的思考，擅于以美国听众为对象发表演说的他，显然胸有成竹。胡适既以自己过去的研究为基础进行教学，讲课的许多内容，都是他在中文著作里已经发表过的，如前行研究者注意不够的费密，就是胡适曾经大花力气研究对象，也出现在讲课内容里。胡适更屡屡提出美国学生熟悉的西方文化的类似事例，阐释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与特色。像胡适提到老子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”等等论说，就举引了亚当、夏娃在伊甸园里最终“沉沦”的故事，提出比较，短短一句“Cf. the Story of Garden of Eden & the Fall of Man”，想来正是胡适谆谆善诱、企图激发学生理解思考老子的解释空间。以这部书为基础材料，结合胡适的其他英文著作，阐释胡适如何扮演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



者，自然深具意义。

本书原件珍藏于台北的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（馆藏号：HS-NK05-209-001~HS-NK05-209-047），度藏多年，知之者罕；经过胡适纪念馆同仁献力，完成原件扫描工作，遂即公开于世。自从2007年个人承乏胡适纪念馆行政业务以来，有幸接触这份文献，深感即使它已然以最原始的形态向世众公开，整理辨读，实非易易，因是问津者甚寡；促成出版问世之可能，常在我心。尔后，有幸结识适之先生乡晚吴浩博士，亦为“胡适研究”同好，共商整理出版之百年大计，得其支持，主持编务，任其繁杂，费心耗神，竟可以最便利的形态，贡献于读者；整理工作初毕，荣幸承蒙史学名家、“中央研究院”王汎森院士惠赐导读，画龙点睛，期为读者“开卷有益”之助，更为本书得以传世永久，提供无限动力。

青年胡适尝言：“天下多少事业，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，今日大患，正是无梦想之人耳。”同志之士，合力共为，个人一己的梦想竟可成真，确实可慰。身处史料丛出、文献缤纷的时代，想要更为深入地探索胡适思想世界的多重面向，凭借愈趋多样，足享左右逢源之乐，实是吾辈读书人最大的幸运。有心之士，执此一编，借以叩问追索胡适独特鲜明的精神遗产，绝对“功不唐捐”。相信本书在“胡适研究”的天地里，深具独特的意义与价值，必将绽放永恒的智慧光芒。

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

兼胡适纪念馆主任

潘光哲 敬序

2017年3月31日

从哲学史到思想史

——胡适的英文《中国思想史大纲》草稿¹

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的《中国思想史大纲》。这份《大纲》是由1554张小纸片组成的²，是胡适1944年底到1945年在哈佛的开课大纲³，这是他最后一次要写一部《中国思想史》的尝试，但是接着就被早先开始的《水经注》问题盖过去了，没能完成⁴。这份《中国思想史大纲》与大家耳熟能详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有很大的不同。

1 本文系根据2013年在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85周年所庆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。感谢周月峰先生听打整理。由于是演讲稿整理而成，所以保留了演讲的语气，请谅解。本文撰写过程中承钱永祥兄、萧高彦兄、潘光哲兄、杨尚儒博士的帮忙，特此致谢。[编者注：本文曾发表于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2017年第3期），经作者惠允，收入本书作为导读。文中《中国思想史大纲》即《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要遗稿（整理本）》。]

2 这些纸片有的一页只有一行字，多的也只有几行。其中，古代有643页，中古（200 B.C.-1000 A.D.）有268页，中古宗教（300-1000）有237页，理学（1050-1650）有326页，反理学（1645-1945）有80页。

3 胡适纪念馆藏号：HS-NK05-209-001~HS-NK05-209-047。

4 这一份《大纲》是1944年秋天到1945年春天胡适应邀在哈佛大学讲课时，写在“拍纸簿”上面，连缀而成的一份大纲。当时上课的情形，杨联陞先生日记及周一良、赵元任等先生都有记述。“中央研究院”的胡适纪念馆中有一封信可以说明，当时麦克米伦公司曾来函邀约，希望胡适将书交给公司出版。胡适的答信说：“每逢谈到这本书时，我总是非常难为情的。因为它只是一份笔记纸排比而成的大纲而已。”这份《大纲》是对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出版之后25年的一个比较整体的呈现，也吸收了许多胡适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内容，包括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》《戴东原的哲学》等。胡适一直想完成一部《中国思想史》，这份《大纲》应该他这方面的最后一次尝试。



(一)

这份《大纲》反映了胡适两种重要转变，第一是“去哲学化”的转变，第二是从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到《中国思想史大纲》中，若干观点的转变。这里先谈第一点。我在《汉学研究》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，事实上胡适有一个阶段很受傅斯年（1896—1950）的影响⁵。1944年底到1945年，胡适在哈佛大学演讲，已经强调他所讲的不是中国哲学史，而是中国思想史了（见图1）。事实上，江勇振先生在《舍我其谁：胡适》一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，胡适后来不希望自己被称为哲学史家，而希望被称为思想史家。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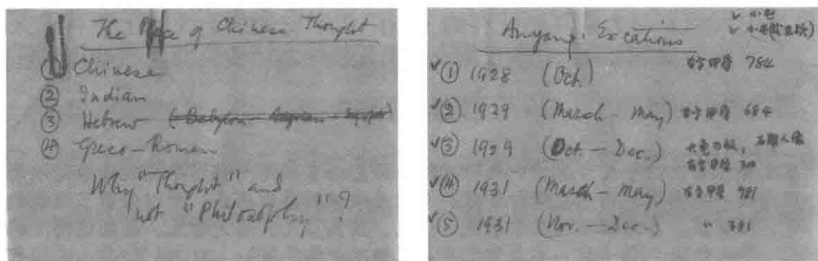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大纲》原稿

“哲学”原来是一个从西方来的词，日本也是从西方学来的。狭间直

5 他写《说儒》时，很受傅斯年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跟《夷夏东西说》的影响，我在文章里面举了很多档案资料，可以看得出来。还有若干方面，其中最后一点，讲到胡适后来对哲学的态度或许跟这个有关。见《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》，收入王汎森著：《傅斯年：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》（王晓冰译），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2013年，第309—332页。

6 见江勇振：《舍我其谁：胡适》，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2011年，第277—278页。“我有时称我自己为历史家，有时称我自己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家，但从来就没有自称为哲学家。”他有意淡化主修哲学，对韦莲司女士说“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”。



树有一篇论文，就是追索日本如何从欧洲学到“哲学”这个概念的。⁷“哲学”到中国来跟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是非常密切相关的。其实近代的心理学、哲学、美学，这几种学问跟王国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。从《王国维全集》中翻译的部分可以看到，王国维译过不少西方的人文著作。他写过四五篇与哲学相关的文章，主要是在说明哲学这个东西对我们而言很陌生，但是个好东西，尤其他跟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讨论到学制的时候，一再强调，哲学是好事情，不要看它好像没有用，它可是一个重要的学科。⁸

蔡元培（1868—1940）对哲学兴趣深厚，他根据文德尔班（Wilhelm Windelband, 1848—1915）写过一本《哲学总论》（1901），早年还译过《哲学要领》《伦理学原理》。⁹他翻译泡尔生（Friedrich Paulsen, 1846—1908）的《伦理学原理》，后来还影响了毛泽东（1893—1976）。毛泽东一生批语最多的两本书，其中一本就是蔡元培所译的泡尔生的《伦理学原理》。¹⁰蔡元培早期对引进哲学是非常用力的，而且起很大的作用。

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，一般都认为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具有里程碑的作用。事实上，在胡适之前有两本书，一本是北大的讲义，即陈黻宸（字介石，1859—1917）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另外一本是谢无量（1884—1964）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谢无量是同盟会的会员。胡适《中国

7 见狭间直树：《西周のオランダ留學と西洋近代學術の移植：“近代東アジア文明圏”形成史：學術篇》，《東方學報》冊86（京都：2011年8月），第131—176頁。

8 见王国维：《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》，收入《王国维全集》，第14卷，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2—40頁。

9 见后藤延子：《蔡元培の哲学：民国の人間像の行動原理》，《人文科学論集》号13（1979年3月），第167—168頁。

10 泡尔生《伦理学原理》的批语，现在《毛泽东早期文稿：1912.6—1920.11》（长沙：湖南出版社，1990年）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当然里面有很多毛泽东自己的想法。



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中，有很多地方显然是针对谢无量的。¹¹谢无量讲哲学，就是从伏羲、神农开始讲起，一路讲下来，胡适认为里面有很多过时的、过度信古的东西。其实谢无量也是受日本影响的，其哲学史也是受近代西方哲学观念影响的，但是他不具有胡适那样怀疑批判的角度。

胡适这本书原名为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，后来重印的时候，才改成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。¹²事实上胡适在台北版的序言里已经讲得清清楚楚，他已经放弃哲学史的想法，改写思想史了，所以“下卷”他不要了，就变成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。¹³所以这牵涉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他会从哲学史转到思想史——后来甚至不太愿意人家称他为“哲学家”。这个转向因为涉及文字的部分多是在私人书信、日记、未发表的演讲稿中，故有些隐晦，不那样引起注意。

1922年，胡适完成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的四年后，哥大邀请他去当访问教授，他考虑到要写《哲学史》中、下卷而不去。可见他那时候还是非常投入哲学史的工作。到1925年，他还出了一本《戴东原的哲学》。可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，可以感觉到胡适对于“哲学”的态度有了一个变化。傅斯年在1926年8月给胡适一封长信，这封长信大概是因为字迹太草，所以没有被收进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，可是在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里面

11 胡书批评谢无量，但是他没有提陈介石，可能陈介石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当时在北大只是讲义，不像谢无量的《中国哲学史》是印本。

12 关于“哲学”在“五四”前后学科间的地位，以及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的问题，可参考罗志田：《大纲与史：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，2000年第1期，第168—174页。

13 见胡适：《〈中国古代哲学史〉台北版自记》，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78年，第1页。



有。¹⁴傅斯年对胡适说，你写的《哲学史大纲》不是第一流的著作，反倒是你的小说史考证，才是第一流的著作。他说，一方面哲学史的著作当时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人写了，但最重要的是你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本来就是错误的。中国人没有“哲学”这个东西，中国只有“方术”，任何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讲中国的思想，本身就是错的。傅斯年并说陈寅恪（1890—1969）的看法与他是一致的，因为不能用伦理学、本体论、知识论去讲中国的东西。凡要用这些去讲，于古代的思想就有增减。

傅斯年又对胡适说道：“我刚到英国时，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，甚至德国哲学书。后来觉得不能懂德国哲学了，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一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。现在偶然拿起一部Hume来，也不知所谓了。总而言之，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。我于这个成绩，也很欢喜。”这代表当时知识界有一种慢慢要疏远“哲学”的倾向。傅斯年在北大学生时期的文字，原来也有很多是牵涉到哲学的，可是慢慢到1926、1927年，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，大概与逻辑实证论有一定的关系，他便开始疏远哲学了。胡适在1926年给他回信，完全同意他。信收藏在史语所的档案里，现在出版了。胡适当时在巴黎，他说：“你最得意的三件事，我却也有点相像。一、近来每用庞居士临死的遗训劝人：‘但愿空诸所有，慎勿实诸所无。’庞居士也许注重在上半句，我却重在下半句。……二、捆人最厉害的是那些蜘蛛肚里吐出来自己捆自己的蛛丝网。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，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，不看西洋哲学书，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，自己感觉很痛快，……这一层

14 已收入王汎森、潘光哲、吴政上主编：《傅斯年遗札》，第1卷，台北：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2011年，第43—52页。



我很得意。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，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饭家伙丢了。”¹⁵

可能受了这一影响，1927年5月胡适访欧回来以后，把他关于中古哲学文雅的标题定为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》。此后他慢慢地就不再怎么谈哲学或哲学史，虽然也谈哲学的问题，但是他以后开课的名都是“思想史”了。1929年他在上海大同中学演讲“哲学的将来”，里面说了一些比较决绝的话。这份演讲稿并未发表，一直收藏在家人手上，直到编纂《胡适全集》时才收入。在这篇演讲中，胡适说：“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、错误的，或失败了的科学”，“最早乱谈性善性恶的孟子、荀子既可算是哲学家……”，“凡科学已解决的问题，都应承受科学的解决”，“凡科学认为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，都成为悬案”，“凡科学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，都应该抛弃”。所以他提到“哲学的根本取消”，“科学不能解决的，哲学也休想解决。即使提出解决，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，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”。他说：“故哲学家自然消灭，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”，“若不如此，他们不是将来的思想家，只是过去的玄学鬼”，“将来只有一种知识：科学知识。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：科学实验的方法。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”。所以为什么他不用哲学史，而用思想史，因为“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：他们的思想，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，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（Hypothesis）”。¹⁶

关于胡适这个重大的转变，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略为讨论过。¹⁷除了傅斯

15 胡适著、季美林主编：《胡适全集》，第23卷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435页。

16 胡适著、季美林主编：《胡适全集》，第8卷，第6—8页。

17 见王汎森：《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》，第309—332页。



年个人的某些影响外，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。用朱执信（1885—1920）的话说：这是个“不去欧洲留学，真没有发言余地”的时代。¹⁸所以西方思想界的最新动向，往往立刻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思想。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西方，的确常见到对传统哲学的诘疑甚至于有“取消”之说。胡适所熟悉的杜威（John Dewey, 1859—1952）固然主张“哲学之重建”，欧陆也正逢维也纳学派开始集结崭露头角。像《剑桥哲学史（1870—1945）》中的“The End of Philosophy as Metaphysics”一文中便描述维特根斯坦（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, 1889—1951）和逻辑实证论兴起时，带来了哲学是形上学以及“哲学的结束”这样的观念。¹⁹不过像胡适这样，认为科学足以完全取代哲学的说法仍然显得极端。杜威认为哲学与科学一样，是一种实验性质的认知方法；维也纳学派认为哲学以逻辑以及语义学的形式，可以继续发挥语言或概念分析的功能。换言之，西方的说法大体上放弃了传统哲学“认识终极真理”的信念，但是仍然给哲学保留一种很谦卑的位置。²⁰由于西方最新的发展，往往就是“真理”之所在，所以胡适不能不敏感察觉到欧洲当时实证主义、逻辑实证论大军压境般的氛围。²¹

18 朱执信在《学者的良心》中纪录，章士钊1919年9月间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说，被四面八方攻击，弄到最后，只好对外表示——用朱执信的话说：“（章氏）从大病以来，已有觉悟。现在不去欧洲留学，真没有发言余地”。见《朱执信集》（下集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660页。

19 这个口号必定给一般人重大的印象。相关讨论请参考Simon Glendinning, “The End of Philosophy as Metaphysics”; Rom Harré, “Positivist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”; Alan Richardson, “The Scientific World Conception: Logical Positivism”; in Thomas Baldwin ed.,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70-1945* (Cambridge, UK;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3), pp. 565-577, 11-26, 391-400.

20 这在近代科学初兴的年代已经常见，如洛克（Locke）说过，哲学家只是负责清理地基，等着如牛顿、波义耳之类的大师负责建造知识大厦。

21 参考Leszek Kolakowski, *The Alienation of Reason: 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* (NY: Anchor Books, Doubleday, 1969)，尤其是第五章。